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第 三 分 册

〔美〕J.W.汤普森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三分册

〔美〕J.W.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四分册

〔美〕J.W.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下卷全两册)

〔美〕J. W. 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6-1/K·494

199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703 千

印数 7 000 册

印张 29 1/4 插页 8

(60克纸本) 定价: 34.2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I,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By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2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2 年第一版译出

目 录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约 1600—1750 年)	1
第三十八章	理性时代	78
第三十九章	德国和启蒙时代	130
第四十章	浪漫主义的出现	179

第七编 近代德国史学的建立

第四十一章	柏林大学: 尼布尔和兰克	201
第四十二章	兰克学派	255
第四十三章	普鲁士学派	280

第八编 19 世纪法国和英国史家

第四十四章	法国史家(1814—1848 年)	307
第四十五章	法国史家(1848—1922 年)	359
第四十六章	19 世纪初叶的英国史家	380
第四十七章	麦考莱、喀莱尔、夫鲁德	401
第四十八章	牛津和剑桥历史学派	423
第四十九章	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家	459
第五十章	研究英国史的德国史家	477

第九编 论述各种制度的史家

第五十一章	法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493
-------	---------------------	-----

第五十二章	英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525
第五十三章	制度史家：城市起源问题	546
第五十四章	经济和社会史家	563
第五十五章	实证学派史家：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601

第十编 古代东方、古典时代和拜占庭研究

第五十六章	恢复古代东方的本来面目	631
第五十七章	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近代史家	667
第五十八章	拜占庭研究的进展	700

第十一编 19 世纪的教会史家

第五十九章	天主教史家	728
第六十章	新教史家	762
第六十一章	《圣经》和犹太史	785

第十二编 欧洲诸小国

第六十二章	北欧诸国	809
第六十三章	南欧诸国	826
第六十四章	东欧和巴尔干诸国	849
索引		884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

(约 1600—1750 年)^①

近代史学始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路德派和喀尔文派同样³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罗梭·索·发拉对于伪造“康斯坦丁圣赐”之事^②的否定做法，也可以用来对待具有教会权威的许多其他传统和文献。历史批判已变成新教手中的武器，而众多文献也被《马格德堡世纪丛书》^③诸编者用作投枪。罗马教会对新教以历史为武器的斗争迟迟未能警觉，竭力把争论限制在神学问题范围以内，但这只是徒劳。以历史为手段的攻击终于变得十分有效，以致罗马不得不以历史还击历史。既然宗教改革是以历史为武器进行的斗争，所以反宗教改革也不得不利用同样手段，从而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④罗马教廷把反击《马格

① 关于史学上这个重要时期，以任何语言写的著作中都没有全面记载。探讨这个时期写的东西，几乎全是专论或期刊性质的。佛特的书第 381—410 页有最好的简要说明，附有出色的书目提要，还可参阅他的导言第 iii—vii 页；这类说明还见于奥古斯特·摩林尼尔的《从原始时期至 1494 年意大利战争为止的法国历史资料》（巴黎，1901—06 年，六卷），第 5 卷，第 159—170 页；在英文著作中可参看 G·N·克拉克的《17 世纪》（牛津，1929 年）第 16 章和史密斯的著作，第 1 卷，第 6 章。在保罗·哈扎那部很好的著作《1680—1715 年欧洲道德观的危机》（巴黎，1935 年，三卷）里分析并阐明了这个新时代的学术气氛。

② 参阅上卷第 521—22 页。——译者

③ 新教徒主编的丛书，专门攻击天主教的。——译者

④ 迦伯列·摩诺的《天主教改革》[巴黎]《历史评论》CXXI(1916 年)，第 281—315 页。

德堡世纪丛书》和新教历史学派的责任委托给红衣主教巴洛尼阿斯(1538—1605),他的《教会年代记》第1卷于1588年由梵蒂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年!①

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和战争,把直到那时众人一向无从看到也无法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档案和其他手稿公诸于世,从而推动了,也便利了人们对历史发生新兴趣,这件事确实奇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许多寺院被解散,德国的农民战争和什马尔卡登同盟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以及随之出现的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被洗劫等情况,使大量手稿和其他文献抛向市场,价格往往非常便宜。不久,学者和书籍收藏家都如梦初醒,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开始抢救这些宝物。16世纪德国新创办的那些新教大学的图书馆几乎完全都是以从这些修道院中劫得的赃物充实起来的。②来自科比和夫勒里等修道院的许多手稿都变成16世纪的得·图、匹陶、度申和其他法国学者的藏书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马撒林首批巨额藏书在福隆台暴动期间③暴徒抢劫他的官邸时散失净尽。在英国内战中许多教会图书馆和保王党贵族在乡间那些巨大宅邸中的藏书也遭抢劫。甚至牛津和剑桥也受到损失。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考斯道夫·阿多发就象一位收割者那样,把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捆起来一齐搂到自己手中。布拉格的书籍和手稿几乎被抢劫一空。④梯里抢夺海德堡大学那座藏书丰富的图书

① 1588年英国粉碎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天主教的支柱西班牙王国衰落下去。——译者

② 考斯道夫·波根,《书籍爱好者、收藏家及所藏史书》(莱比锡,1922年,三卷)第3卷,第113—19页。

③ 1648—53年间法国贵族反对王权的暴动。——译者

④ 参看鄂图·沃尔德的《文化史目录学研究》(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1916—20年,两卷);R·埃沃尔德的“哥达图书馆史”,见《图书知识中央报》第18期(1910年),第434—63页;C·P·库波的《英国最重要公文记述等》(伦敦,档案委员会,1832年,两卷),第1卷,第51页。以撒·科利英的《乌普萨拉皇家大学图书馆早期书籍目录》(乌普萨拉,1907年)说明五百册书中差不多每册都是“瑞典劫掠品”的一部分。

馆的事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吗？

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兴趣、新的学术条件和新型学者。在这种新的探索中，法国是开路先锋。佩耳·匹陶(1539—96)是创始人。他出身于法国著名法律家家庭，是史学家得·图的朋友，他二人共享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史学界的荣誉。他编辑并出版了萨尔维安、助祭保罗和弗赖辛主教鄂图等人的著作以及查理大帝、笃信者路易和秃头查理等帝王收藏的教会法规。他临死时正在整理普瓦捷人海拉里的历史残篇。他的朋友尼古拉·勒·非甫尔出版了这部书，并在书前附了一封献给得·图的信，信中说明了这些手稿和匹陶建议编订这部手稿的情况。匹陶关于收集并编订中世纪法国史料的梦想后来由圣摩耳修道院柏尼德提派修道士实现了。^①

但有志于此的并非匹陶一人。他是和安得烈·度申(1584—1640)分享这个荣誉的。在胡格诺战争摧残下当法国许多修道院也象早些时候英国诸修道院的宝藏和书籍遭洗劫时那样，度申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手稿收集家。他收藏了大量手稿，据说这批手稿曾形成“从有史以来直到16世纪法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文库”，手稿的一部分后来落入科尔伯特手中；又一部分装订成59巨册，以度申藏书的名义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度申仅仅出版了他5
这批庞大收藏的十分之一。他计划写一部24卷对开本法国史巨著。前14卷包括从图尔人格雷戈里到15世纪末所有重要法国史家的著作。后十卷专载法国各省地方史。前一部分仅仅出版了《丕平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家的著作》计五卷，1640年他因车祸去世后由他儿子完成。地方史部分仅仅完成了《古代诺曼史家著作》(Historiae Normannorum scriptores antiqui) (1619年，五卷)，这部书成了度申的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这

① 关于他的著作的完备书目，参阅《大百科全书》第26卷，第992页。他写了大量法律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编订的《西哥德法令》。

些书出版时都未附序言和注释。作为原始范本，这些书曾经是所有研究诺曼史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重新校订过的诺曼编年史家的著作开始取代它们。度申受到黎塞留的知遇，被任命为王家历史官兼地理官。人们称他为法国史学鼻祖，他确实当之无愧。^①

在历史写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上，法国也领先。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冉·波当的《史学方法指南》(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巴黎，1566年)。^② J·J·斯卡力泽(1540—1609)破题儿第一遭把年代学置于科学基础上，他的《年代校订》(Thesaurus temporum) (第1版，1583年)是在他审查并改编《攸栖比阿斯的编年史》(Eusebian Chronicle) 时受到启发写的。马克·帕蒂森说^③：“斯卡力泽在历史批判方面的伟大著作超过下一代任何人的鉴别力。……只有偶尔出现的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学者，……才有本领估价斯卡力泽的巨大成就。……[他是]史学批判的创始人。……耶稣会对斯卡力泽的攻击……是他平生一件重要的具有特色的事情。”和他通信联系的人遍及新教欧洲。卡姆登曾于1594年把自己编的《大英帝国》(Britannia) 寄给他一本。在罗马铭文很少的英国，斯卡力泽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里，但由于其中希腊典籍也十分缺少，他很失望。但他并不是干燥如土的6 学究。令他惊异的是，英国竟没有领主裁判制；许多边疆歌谣富有

① 安得烈·度申的主要著作是：《法国历代国王辉煌威仪的遗迹与研究》(巴黎，1609年)；《法国全境的城市、宫殿、……等古迹与研究》(巴黎，1608年，两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史》(巴黎，1614年)；《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巴黎，1616年)；以及《从408到1350年勃艮第国王、公爵和伯爵的生平》(巴黎，1619—28年，四开本；1634年，两卷，对开本)。除这些以外，度申还出版了许多著名法国家族谱系，其中最好的据说是芒模伦西家族史。他的《法国红衣主教与圣徒传》已由玻兰达斯派、马比昂和其他等人刊印。他还出版了朱文那尔的《讽刺诗》译本，以及阿伯拉德、阿郎·沙退和亚田·帕斯提等人一些著作的校订本。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4卷，第1185—86页。

② 见本亥姆的书，第217—20页。

③ 见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32—34页，关于斯卡力泽，参阅第132—243页。

文学魅力；玛丽·斯图亚特的美貌；英国北方使用煤炭而不用木柴；牛津和剑桥二校研究生们竟是这样懒惰。^①

在促进这门新学问发展方面，法国的法学家和古文物爱好者也尽了自己一份力量。伟大的邱哲细阿斯的《罗马法论注》(Commentaries on Roman Law) 于1578年出版。登尼斯·哥陶弗列杜，即高得弗罗·兰欣(1549—1621)编辑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法律著作或法律汇编——包括罗马法、封建法、宗教法等等——这项工作后来由他儿子雅克·高得弗罗(1580—1652)继续进行。他的巨著即《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六卷)。他为这部书花了30年的功夫。这部巨著的成就赢得从当时直到现在一切罗马史家的赞誉。吉本、蒙森和迪尔等都曾大量使用他这部书里的材料。^②

亚田·帕斯揆(1529—1615)是法国律师界的光荣，也是这群优秀历史家当中的一位。1560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作《法兰西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这是一系列考古和历史研究论文，其中最出色的一篇讨论的是大陪审官制度(Grands Jours)的历

① 1590年斯卡力泽迁往莱顿接替业已转变为天主教徒的力普西乌，这是16世纪学术的里程碑。参阅《约瑟·斯卡力泽自传》，G·W·罗滨孙将此书译为英文，并附有许多摘自斯卡力泽的书札，他的遗嘱，以及但以理·亥因栖乌和多密尼克·鲍底阿斯的墓前致词中的引文(剑桥，马萨诸塞州，1927年：哈佛翻译丛书)。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可参阅雅各·柏尔奈斯的《约瑟·查士塔斯·斯卡力泽》(柏林，1855年)，在《伦敦》[《评论季刊》]第108期(1860年)第34—81页中有详细评论；参阅帕蒂森的书，第1卷，论文第6—7页，和他的《以撒·加索姆，1559—1614年》(第2版，牛津，1892年)；桑兹的书，第2卷，第199—204页；以及尤金和Em·哈格合写的《法国新教或在历史上自称法国新教徒的传记》(巴黎和日内瓦，1846—59年，十卷)，第7卷，第1—26页。

② 高得弗罗父子是胡格诺教徒。父亲从1600年到1621年任海德堡大学法律教授，1621年梯里洗劫海德堡时被赶走，丧失了自己的图书。雅克·高得弗罗生于日内瓦，并在该地度过一生，他的兄弟狄奥多尔·高得弗罗(1580—1649)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定居法国。1617年被委任为王家史官，并数次以大使身分被任用。1649年在蒙斯特逝世。他是一位多产史家。关于三位高得弗罗的著作的全部目录，可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8卷，第1145—47页。

史，这个制度在下一世纪就衰落了。1585年帕斯揆被任命为贴现院(Chambre des Escomptes)大律师。他曾出席1588年在布卢瓦举行的三方议会^①，吉兹公爵就是在议会里遇刺的，他在那里还曾遇到蒙田。

这就是17世纪博学时代的史学和文献学的背景。这是一个高贵的遗产。但在进行专题讨论以前，不妨停下来先看看历史写作和历史学术上那些阶段和过渡，也象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那些7 阶段和过渡那样，这也是值得的。17世纪的学术可以看作类似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古希腊文化后期的东西，或简称第二个古希腊后期^②。博学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或博学时代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区别，比这些时代在年代上的差距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意义要大得多。这种差别是在思想结构、学术兴趣、精神状态等方面都已起了变化的质的差别。已故的J·富兰克林·詹姆森教授^③在一篇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世界从这样一个时代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和历史成果。非凡的博学家比非凡的天才多得多。当时的风气是冷静地、有条不紊地收集资料。更加受人尊重的是极其充分地介绍原文和历史文献，而不是撰写叙事史或抓住古代高谈阔论。对开本书籍比8开或12开本更受欢迎。拉丁文比本国话更为流行，马斯科《古代德国史》^④的主要评论家热情地说：这部书如此之好，却没有用拉丁文写，真令人遗憾。……对这个时代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出版数量方面极其巨大。从1650至1750那一百年间，……不算其他著作，仅就满载早期教会和中世纪史原始文献的书

①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译者

② 参阅上卷第3章。——译者

③ 美国史学家(1859—1937)，著有《美国史词典》(1894年)及《把美国革命当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1926年)等书。——译者

④ 《法兰克王国开国以来的日耳曼史》(莱比锡，1726年)。这部书由托马斯·列第亚德译成英文，名为《古代日耳曼史》(伦敦，1737—38年，二卷)。这个译本是吉本的主要根据之一，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不能阅读德文。

籍而论,据估计,只是在法国一国就出版了对开本400部以上。……人们如果设想其数量如此惊人的学术成就仅仅是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或无视这些学识的相对价值及其较高的用途,那就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这项搜集工作花费的极其大量的劳动有其自觉的目的。这一点,从当时历史和古典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的得到发展及那些不朽的参考用书的编撰方面所依靠的智慧和有条不紊的技巧,可以得到明证。

在广泛研究纯古典学术方面,16世纪的斯卡力泽、加索绷和力普西乌这样一些人的名声可说是高于本特利或格洛诺维阿斯^①。但铭文学的提高却是法布雷提^②和穆拉托里^③的功劳。杜·孔日先生^④把晚期和中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编成百科全书式的辞典。马比昂以他那篇典范论文《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一劳永逸地为古文书学这门科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其他学者使年代学和古文字学、书目学和古钱学都有了条理分明的、科学的形式。这类探讨辅助学科的论文的一些对开本或者象培尔的《词典》(Dictionary)一类学术百科全书表明,这个时代尽管或许有些缺乏远见,但至少可以说除了搜集外,他们也部分地意识到欧洲学术的正规发展需要条理,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批判地注意和仔细地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经常要求有编得更好一些的原文;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许多对开本巨制,由于其论题得当,也很少被近代学者认为无用。那一套套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编年史或圣徒传记、一套套国王的、教皇的、高级教士的以及寺院和宗教会议的信件和文件,那些卷帙浩繁的教会领袖的作品或各省各地区的资料,仍然是历史家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不借助于博学时代那些无畏的人们的辛勤劳动提供了这些资料的话,教会史或中世纪史里边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是无法进行彻底探讨的。^⑤

① 荷兰古典学者(1611—71),校勘李维、塔西佗等古典作品。——译者

② 本书原书第21页。——译者

③ 本书原书第50—51页。——译者

④ 本书原书第29—31页。——译者

⑤ 见富兰克林·詹姆森的“博学时代”,这篇文章是1905年6月12日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年一度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讲稿,载在《[芝加哥]大学学报》第10卷(1905年),第19—28页。我觉得引用这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正确的,因为这篇好文章再也没有重印,而且事实上是无法得到的。

博学时代的历史学者那种强烈的献身精神、那种不知疲倦的下苦工夫、那种惊人的巨大的编撰本领,件件都使近代学者惊叹不已。即使考虑到下列情况:当时没有报纸、期刊、小说等分散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当时在学校里教的公共科目比现在少得多,并没有公开讲演和电话分他们的心;为了和世界学术水平保持一致,当时只需要一种语言,拉丁文,或者,如果他是一位古典学者或神学家,再加上一门希腊文就行了——即使考虑到这一切之后,仍然会令人惊异不已。而且,这种惊人的学术成就大部分都是政府毫无所知的,更接受不到政府的任何指导。学者与政治无关,受不到政治控制的影响。甚至文学、科学等领域与历史研究领域之间也几乎毫无接触。

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有一个触目的事实,即这些工作大多是共同合作的产物。出众的、不依靠他人的独力工作者也可以找到,但广泛流行的却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点本身就给这个时期打上印记,因为这和以个人主义为突出特点的文艺复兴时期大不相同。

史学界这种通力合作最早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波兰达斯派神父协会的一个团体。^①耶稣会在其创始时期

① 关于波兰达斯派和《圣徒行传》的文献是很多的。参阅Ch·得·斯麦得在《天主教百科全书》第2卷第630—39页上发表的文章,附有许多书目提要;季尔第的书,第190—211页,论“波兰达斯派”,附书目提要;《比利时本国的传记》,第1卷,第630—41页论波兰达斯派的文章;希坡利特·得勒赫伊的《三个世纪以来(1615—1915年)波兰达斯派的工作》(布鲁塞尔,1921年),英译本为The Work of the Bollandists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1615—1915(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厂,1922年);同一作者的《圣徒传说》(第3版修订本,布鲁塞尔,1927年),V·M·克洛福德夫人根据第2版译成英文,即《圣徒传说,圣徒行传导言》(伦敦,纽约,1907年);F·贝克斯的《波兰达斯主义复兴一百周年》,载在《教会历史评论》,第34期(1938年),第270—96页;得·斯麦得关于波兰达斯派创建者的论文,见[杂文]《论高得弗罗伊德·库尔特等》(列日,1899年)第1卷,第297页以下;“波兰达斯派圣徒传”,见《天主教界》第27期(1878年),第756—65页和第28期(1878—79年),第81—87页;奥里略·帕尔麦里“波兰达

(1540—90年)把宗教生活感情化、理想化了，从而征服了人们的心。“它几乎垄断了圣洁的美名并以善于掌握敏感的天良著称。……在纯粹宗教虔诚的基础上，它为教会赢得彻底胜利。”^①该会在其第二个时期(1590—1715年)，曾竭尽全力夺取学术园地。直到17世纪，还没有人尝试把批判的原则应用于以《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著称的浩瀚的中世纪文献上。在这方面的先行者蒙布里提阿，李帕曼那斯和苏里阿斯等都是辛勤的编辑和虔诚的注释者，但他们缺乏批判精神或方法。在过去许多世纪中，圣徒行传业已搀杂传奇式的内容，并以难以置信的逸闻加以美化，甚至引起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嘲弄的愚蠢的无稽之谈也常常塞入其中。波兰达斯派的目的就在于从受人蔑视的境况中把圣徒行传拯救出来，并把它们作为大量宗教和历史文献的真正性质和价值确定下来。

这项庞大计划由耶稣会的赫伯特·路斯威德带头干了起来；他1569年生于乌特勒支，死于1629年，当时他的计划除了大纲以外并未完成多少。在他的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在杜埃学院当教师的那些年，他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低地诸国那些修道院和教堂的图书馆里浏览群书，并发现实际上久已埋没无闻的大量圣徒传记

斯派”，见《天主教历史评论》新3期(1923年)，第341—67页和第517—29页；罗伯·列沙特，“波兰达斯派圣徒行传”，同上杂志，第6期(1920—21年)，第334—42页；萨宾·贝灵-谷尔德《圣徒传》(新修订本，爱丁堡，1914年，十六卷，第1卷，导言；《书板》，1922年4月8日特斯頓的著作；B·奥贝，“波兰达斯派的工作”见[巴黎]《两世界评论》，第73期(1885年)，第169—99页，红衣主教冉·巴普提斯特·皮特拉高僧，《波兰达斯派耶稣会教士对圣徒传记集的研究》(巴黎，1850年)；查理·得约伯，《特伦特宗教会议对天主教人民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路易十四时代文学史序言》(巴黎，1884年)，第3章；恩斯特·芮农，《宗教史研究》(第7版，巴黎，1864年)，第301—15页；希坡利特·得勒赫伊，《写圣徒传的方法》(布鲁塞尔，1934年)；G·F·斯托克斯，“波兰达斯派”，见[伦敦]《现代评论》第43期(1883年)，第69—84页；F·C·柏刻特等人：《圣芳济会论文集》，第2卷(曼彻斯特，1932年)。

① 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87页。